

论宋代“语录体”对文学的影响

任竞泽

—

二

尽管语录体从先秦《论语》、《孟子》到唐宋儒道释语录，从诗话、奉使伴使语录到小说、历史等文体，名称含义很宽泛，不尽相同，但由于宋代理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元明清以后，谈语录者便基本特指以程朱语录为代表的宋人语录了。尤其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书评文之内容艺术及体例优劣时，更是频频以诸如“语录之体”、“语录体例”等突出强化了语录体这一文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征。

宋人语录有几个主要特征，下面结合四库馆臣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简述之。1. 形式上，哲人学者讲学或与时人辩论、师徒问答，由门徒弟子记录下来。如宋汪莘《方壶存稿》提要：“其中《水调歌头》二首至以‘持志’、‘存心’为题，则自有诗余从无此例，苟欲讲学，何不竟作语录乎？”明胡广等《性理大全书》提要：“自汉以来，弟子录其师说者始于《郑记》、《郑志》，是即后世之语录。”清张鹏翼《芝坛集》提要：“其诗文皆以讲学为宗，体格多近于语录。”2. 内容上，推阐性命，统论义理，关涉道学理。如明刘驷《爱礼集》提要：“驷宗陈淳之学，诗文多涉性理，略似语录之体。”明钱一本《四圣一心录》提要：“又舍数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阐之以至于性命，体例近乎语录。”清程廷祚《程氏易通》提要：“其精义统论义理，通其说于道学，略如语录之体。”3. 语言上，方言土语，鄙俚通俗。如宋林之奇《拙斋文集》提要云：“此集所载诸篇皆明白畅达，不事拘束，亦无语录粗鄙之气。”又宋姚勉《雪坡文集》提要：“文亦多妍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元董鼎《孝经大义》提要：“其注稍忝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

宋人语录内容上多涉性理和语言上鄙俚凡俗，对文学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宋季以刘克庄的批评指责最为辛辣有力，其影响远及清代四库馆臣。清人非议宋人语录和喜用“语录”评文并促成这一经典批评术语的形成，是清初“宋诗派”的兴起和“桐城派”古文的繁荣等文学思潮的反映。宋季江湖派领袖刘克庄对语录体的尖锐批评，主要针对语录体在内容上多涉性理。如：

本朝文治虽盛，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艺文，朱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氏意，水心叶氏又谓洛学兴而文字坏。

——《迂斋标注古文序》

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数十大作家，俱未免此病。

——《跋竹溪诗》

可谓言辞老辣，对宋末理学笼罩下诗文积弊的文学现状批驳得入木三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跋恕斋诗存稿》所言“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耳”，简直就是对上述论断的浓缩。宋末周密便以“押韵语录”择要为条目标记了这段话。

此后，到了清代四库馆臣在撰四库提要时，“押韵语录”、“以语录为文”、“抄撮语录”等语俨然成了诗文评之经典术语而被频频使用。如：

亦殊有诗情，固未可概以有韵语录目之矣。

——宋尹焞《和靖集》提要

其末年亦颇欲附托于讲学，然其诗比属高雅，究非有韵语录之比也。

——宋吴芾《湖山集》提要

性夫，讲学之家，而其诗气韵清拔，以妍雅为宗，

绝不似宋末有韵之语录。

——宋艾性夫《剩语》提要

多讲易之文，其说皆宗程朱，诗则有韵语录。

——清王凤九《汇书》提要

等等。四库馆臣拈出刘克庄之“有韵语录”一语，不但用于评价宋人诗文，对元明清历代诗文著作都反复使用，这既说明了这个批评术语的经典性和普适性，也反映出了“语录体”文体特征之鲜明独特。

语录对诗文的负面影响除了上述在内容上多涉性理，缺乏比兴、情境等文学性外，语言上以鄙俚方言入文，有违典雅，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如：

盖学有本原，则词无鄙诞，较以语录为诗文者，固有蹈空征实之别矣。

——宋王炎《双溪集》提要

然其杂文乃平正醇雅，无宋人语录方言皆入笔墨之习。

——元胡炳文《雪峰集》提要

诗仅存十余首，虽亦濂洛风雅之派……而较诸演语录以成篇，方言俚字无不可以入集者，亦殊胜之。

——元汪克宽《环谷集》提要

语录体是宋代理学的派生物，而“击壤派”和“濂洛风雅派”是理学家诗文的代表，故而四库馆臣往往把语录体与此二派放在一起共同评诗论文。如：

惟其诗多沿击壤集派，文亦颇杂语录之体，不及周、楼、陆、杨之淹雅。

——宋陈著《本堂集》提要

然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

——元许谦《白云集》提要

今观其诗，皆濂洛风雅一派，其文亦类语录讲义，盖其渊源如是。

——明陈琛《紫峰集》提要

可以看出，清代四库馆臣对刘克庄批驳宋季诗文流于“有韵语录”之弊极为认同，进而将“有韵语录”和“语录为文”作为经典批评术语来频繁品评宋元明清历代诗文著作。那么，四库馆臣对刘克庄观点的认同以及热衷于用“语录”评文是基于何种原因呢？这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没有关系呢？结论是肯定的，清初“宋诗派”之争和“桐城派”古文尚雅的观点是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因素。

首先，清初“宋诗派”的兴起和广遭非议。清初一

些文人有鉴于明代前后七子学唐之肤廓浮响和竟陵派的纤仄峭硬，转而从宋诗中寻找出路，遂形成一股宗宋思潮。但这种学宋也因而形成了一些弊端，如因散文化、口语化成分增多而导致语词鄙俚浅俗等，故持非议者大有人在。如姜宸英就对当时学宋诗而趋于鄙俚的倾向大加挞伐：“无论市儿村姬骂街诟室俚鄙之说，皆强取而韵之，谓之为诗，此学究之陋，借宋人以自诡者也。……数十年以前，学者竞为浮响，浮响者志失；今时竞为鄙俚，鄙俚者声亡。二者均病，而鄙俚之病于今为甚。”（《汪中允秦行诗略序》，见王镇远、郭国平编选《清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而四库馆臣对“语录”鄙俚之习的厌憎和熟知，便自然而然地将语录体俚俗之特征与“宋诗派”的口语化挂起钩来，成为抨击“宋诗派”的得力武器。如王士禛《精华录》提要云：“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再如毛奇龄《徐宝名诗集序》：“往者见宝名于姜侍御座间。会侍御创诗体，祛风雅旧习而易为谰言，一如判宋人语录而假以韵者。此即后此学宋者所嚆矢也。”（《西河集》卷五四，《四库全书》本）也把“学宋者”之“祛风雅”而“易为谰言”俚语的弊端以“语录”之鄙俚特征进行对应批评。再如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提要云：“（本朝）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既指出宋诗派兴起的原因，也明示“宋诗质直”，其弊在于“直而好尽”，深切道出了宋人“语录体”通俗直白、如话家常的文体特征。

其次，“桐城派”古文尚雅洁的观念与语录体之俗俚相悖。桐城派古文家论文尚“雅洁”，故主张于语录之“芜杂俚近”之辞，不可入于古文。从方苞到姚鼐都是持此观点的。如方苞云“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姚鼐《复曹云路书》：“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愿先生凡辞之近俗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惜抱轩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述庵文钞序》亦云：“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惜抱轩文集》卷四）后来吕璩《初月楼古文绪论》亦有“古文之体……忌语录”之语。李绂也曾提出古文写作应“禁用儒先语录”。其《古文辞禁》云：“语录一字，始见于学佛人录庞蕴语，

相沿至宋，始盛其体，杂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干矢橛’之类，秽恶不可近。而儒者弟子无识，亦录其师之语为语录，仿其体，全用鄙言，如‘彼’、‘此’字自可用，乃必用‘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无论理倍与否，其鄙亦也甚矣。……南宋以还，并以语录入古文，展卷恍然，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也。”（《穆堂别稿》卷四四，清乾隆十二年刻本）南宋人对此已有觉察和评议。如魏了翁《答池州张通判》云：“惺惺，此是语录中如‘活泼泼’‘满腔子’之类，皆用世俗语。铭词用此，稍欠优雅。”（《鹤山集》卷三三，《四库全书》本）李绂之论与此极为相似，其承沿之迹宛然。

经过清代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诗文流派的批评实践和四库馆臣的大力宣扬，“语录体”在清代一些文人手中，已逐渐作为稳固的批评术语并形成定型的、有明确指向的批评模式。不管这种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在具体操作时是否合理，但其本身的独立性和使用的普遍性，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三

同为儒家语录体的代表，《论语》与程朱语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前者如日月高悬，泽被后世非一代也。如《论语》、《孟子》为现当代所有文学史所必选论。后者则“臭”名远扬，历千余年仍不免为人所诟病。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原因很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简明而深刻地道出了二者在文学史上的不同命运。清韩荃《诸儒语录论》一文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结合此文，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一，是弟子不善记录，即“记者之失也”。这首先要责任在于程朱语录之记者“尊信其师之深，亲承其警欬”，这样一来，对老师的话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不敢有一毫增损，恐不得其真”。也就是不能进行必要的加工文饰，其弟子“无有整齐比属，使有文章伦理便于诵读而寻绎者”的再创造，“故直录其语，不加剪裁”。这也反映了弟子素质的高低。《论语》出于曾子、有子、子夏之徒，这些门弟子之记录圣言者，简重而有体，“所记皆得于圣人之深者”，故“谨严尔雅，绝有体要”。孟子之徒万章、公孙丑记其说也如此。故而程朱弟子“方言俚语，随得辄录”的作法，“诚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岂必出万章、公孙丑下哉”。《御选唐宋文醇》评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云：“即宋时至今未千年，而诸儒语录即有不可明者，可以复验也。故仲尼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是书中之难解者，转系当日之质言，人人易晓者耳。若文言之，则如典谟及《论语》之文，不如是诘屈聱牙矣。”（《御选唐宋文醇》卷一〇，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所谓“言之无文”，既指语言要有文采，要文雅，也指质言需要加工，需要文饰，如典谟、《论语》一样“文言之”，否则即便“当时质言，人人易晓者”，虽时代不远也会有“不可明者”，这自然会“行而不远”了。

其二，弟子记录师言不仿《论语》，反效释语录，入手源头上便错了。“宋时僧徒陋劣，乃有语录，儒者亦效僧家作语录。”“故直录其语，不加剪裁，独怪儒者服圣教，立圣言，而其书如释氏之书无为也。”这在姚鼐《复曹云路书》中同样有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这说明，宋世儒者弟子不汲取其正统血脉《论语》、《孟子》弟子的成功经验，却从儒家极力反对的佛教徒的作法中入手，无怪乎其“行而不远”了。这一方面在于宋世儒者弟子之见识短浅，一方面也看出禅宗对儒学的深刻影响，最终造就了融儒道释三家为一体的“新儒学”。

其三，“辞达”非指以方言俚语为文。“所谓辞达而已者，亦谓其辞则然，而非方言俚语亦可以为辞也。”孔子的“辞达”指辞能达意，使人明白易懂，这是对其弟子的要求，其弟子也确实能做到“整齐比属”、“文言之”而达到“言近指远”、“辞约意丰”的效果，而非如程朱弟子“不加剪裁”，“方言俚语”“随得辄录”。《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对此论述尤切近。姚鼐《复曹云路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词气不能远鄙，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可见曾子对老师“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深刻理解和遵守，并力戒词气鄙俚。再如明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孔子、孟子，可谓条达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于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无以条达，遂谓《论语》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悦宋儒，遂并孔子《论语》视同宋儒语录，不复论其文邪？”（见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也说明了《论语》之“条达”、“辞达”与宋儒语录之“方言俚语”的口语化是有言之“文”与言之“不文”的根本区别的。

其四，“文质彬彬”与重道轻文。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强调“辞达”，“文质彬彬”，其弟子亦深得师之要领而躬践之，故而《论语》能如日月光照万世而不磨灭。宋世儒者则不然，他们重道轻文，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为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也正是受儒师

这种观点的熏染，故弟子也因此“言而无文”，也因此宋世语录“行而不远”了。有关“文与道”与语录的相关论述，如冯班云：“儒者恶文字恶读书，恐天下之人皆化为市人矣。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后人？如儒家语录率然之语，往往意是而词有病，后人读之误认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的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为东坡而发。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却须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爱文。”（《钝吟杂录》卷二，清借月山房刻本）可谓透辟。不但如此，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更非常明确地认为宋世语录“非文”也。其《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谯君墓志铭》云：“论今士习之弊，不本之躬践，不求之经史，徒剽取伊洛间方言以用之科举之文。问文，则曰：先儒语录也。语录，一时门弟子所传抄，非文也。”（《鹤山集》卷七六）的确，这种以“道学”、“载

道”为借口以掩饰其不文者所在皆是。如明杨慎《陆韩论文》：“近世以道学自诡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为文。其文不过抄节宋人语录。”（《升庵集》卷五二，《四库全书》本）

要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简明而深刻地道出了同为语录体代表之《论语》、《孟子》和程朱语录在文学史上的不同命运。尽管可从文道关系、“记者之失”、“辞达”、借释家语录入手之误等几方面来阐述出现这种不同命运的原因，但上述视角的归宿则都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一孔子及其弟子的作文圭臬之上。当然，先秦文史哲不分，使得《论语》、《孟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源头之作；而后世文学与哲学各自成为独立学科，宋人语录已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其文学性的消失亦为历史必然。这一点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岭南词风“雅健”辨

范松义

岭南词史始于五代，时何成裕“尤工小词”（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二《南汉五·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0页），今其词不传。又，学界素以五代人黄损为见于载籍的最早的岭南词人，黄氏词今传一首，曾昭岷等已辨其伪（见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80页）。北宋岭南不见有词人。后至南宋，粤人方渐有词名。自此至明代，岭南词人数量并不多，总体成就也不够突出。入清之后，岭南词坛风气大开，词人群起，名家辈出，已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南天劲旅。对于岭南词，有学者认为其总体风格偏于“雅健”，这种认识与岭南词之实际并不相符，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 岭南词风“雅健”说的提出

岭南词风“雅健”说的提出者是陈永正先生，其《岭南历代词选·前言》云：

正如岭南诗以“雄直”的诗风著称于中国诗坛那样，岭南词的风格是偏于雅健的。境界雄伟，气势劲厉，音调高亢，直抒胸臆，得阳刚之美，在凌

云健笔中又有一股清雅之气，因而便不会流于叫嚣直率。从南宋的崔与之、李昉英，到明末的屈大均，以至清代诸名家，都有不少豪放高雅之作。

至于“雅健”风格之源头，陈先生认为即是南宋岭南词人崔与之。《岭南历代词选·前言》论崔氏之《水调歌头·题剑阁》一词说：

此词笔力老健，感情深挚，表现了词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和守边御敌的决心，风格豪放雄浑，纯属辛弃疾一派。崔与之此词，对后来的岭南词人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南宋后期的岭南词人李昉英、赵必璩、陈纪等，便是这种词风的直接继承者。

在李昉英之小传中，陈氏又谓其词“风格峻健，近辛弃疾一派”（朱庸斋选、陈永正注《岭南历代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综合这些论述可知，所谓“雅健”词风，即是指以辛弃疾词为代表的刚健豪迈的风格。

后陈永正先生主编之《岭南文学史》贯彻了这种观点。如论清中叶之岭南词时说“粤人诗词，多以雄直雅健为宗，